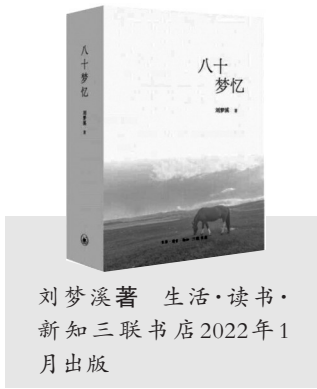




熟读钱先生

我和钱锺书先生没有见过面，但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，因为创办《中国文化》杂志，也由于当时想着手对钱先生的学术思想做一些研究，跟他有不少通信。他是我非常尊敬的前辈学者，不仅是欣赏，而且是特别尊敬和心仪的人。我研究晚清民国以来的现代学术思想史，钱先生是我重点关注的学术案例。

80年代中期，我开始做这方面的题目。决定对王国维、陈寅恪、钱锺书这三位真正大师级的人物，做个案分疏和综合比较研究。这是我从文学研究转入思想学术史研究的一个契机。方法是从细读他们的著作开始。最先读的，是钱锺书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钱先生的每一本书、每一篇文章、每一行文字，我都读了三遍以上。

内子陈祖芬写过一篇文章，叫《不敢见钱锺书先生》，其中写到，在80年代，如果你在北京的街头巷尾，看到一个人，或者在公共汽车上，或者在路上，

在树下，在墙边，在任何地方，都拿着书看，这个人看的一定是《管锥编》或者《谈艺录》。她这样写是写实，不是文学描写。我的确读钱先生读得很熟，熟到他成为和我日夜相伴的人。不仅他的书一本一本被我画乱了，读钱的笔记也积下好多册。

通信起因

通信起因于1988年11月中旬，我和内子出差无锡，趁便访问了无锡新街巷钱先生的故宅（见图）。回京从一位小友处得知，钱先生已经获悉有人去他老宅拍照。这样一来，我们就不好秘而不宣了。于是我在当年的12月1日，给钱先生写了一信，具道首尾缘由，并附呈在钱宅拍的照片四张，请求宽谅我们的冒昧。

12月7日，钱先生写来了回信：

梦溪同志：

来信使我惊愧交集。我是老病之人，知道你大病初愈，很有“相怜岂必病相同”（拙句）的情味。承寄照片，看了全不认得，也许房子变得太厉害了，更可能是我自己变得非复故我了。我对旧事不感兴趣，也懒去追忆，因为记忆是最善于捣鬼撒谎的，而忘怀不失为一种心理保健。来信说对拙著反复阅读，我就请你翻看《管锥编》497-8页论“华子病忘”的一



节。我于1935年出国后，只回家两次，一次半天，一次一天一晚。吴女士不识何人。静汝侄女六年前曾来京相访。我不值得你费心研究，真诚地劝你放宽视野，抬高视线，另选目标。我自己有个偏见，考订作者的传记往往是躲避研究作品本身的防空洞。吴忠匡君的文章记事尚不失实，抄出的诗多不是我称心之作——也许当时没有给他抄存，也许他的诗识和我的不同。是否值得英译，我不便表示意见。中外一些刊物和学会邀请我挂名“顾问”“理事”甚至“名誉主席”之类，我一概敬谢（得罪了不少同志）。虽然“政策是区别对待”，但是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”，未便破例，务请原谅。祖芬女士的文章，我们钦佩已久。你有这样一位“文章知己，患难亲人”，可喜可贺。杨绛的小书承你青眼，她也惭愧得很。草此后谢，即叩

双安

钱锺书敬上，杨绛同候，十二月七日

凡我信中涉及的事项，钱

先生一一作答，无一遗漏。因为我当时正在做的题目是《中国三大批评家：王国维、陈寅恪、钱锺书》，后来此书没有写成，原因倒不全是钱先生的忠告，而是读完钱之后读陈，竟陷进去未能出来，变成专门研究义宁之学了。由于我信中提及，有撰一钱、杨简谱之想，故钱先生回以“考订作者的传记往往是躲避研究作品本身的防空洞”的妙语。

吴忠匡是钱先生尊人钱基博的学生，抗战时期曾一起赴湖南蓝田师范，以此知钱先生事甚详，所为文后来在《中国文化》创刊号上刊载。《中国文化》创刊时，原拟同时出版英文版，所以涉及钱诗的英译问题。我信中还婉转陈词，询问可否请他破例俯允做《中国文化》之学术顾问，他的回答让人忍俊不禁：“虽然‘政策是区别对待’，但是‘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’，未便破例，务请原谅。”

钱先生在信的开头说：“我是老病之人，知道你大病初愈，很有‘相怜岂必病相同’（拙句）的情味。”当时我的确生过一场不小的病，迁延经年，至1988年夏天，始逐渐康复。只是不知道钱先生何以知之。他顺手拈来“相怜岂必病相同”句，让我感动得不知何似。也许只有钱先生信中使用的“惊愧交集”四字，庶几近之。

钱先生此信我们收到没有几日，又收到他另寄的一页法书，用的是荣宝斋宣纸印笺，上写《还家》诗一首：

出郭青山解送迎，劫余弥怯近乡情。故人不见多新冢，长物原无只短檠。重觅钓游嗟世换，惯经乱离觉家轻。十年湖海浮沉久，又卧荒斋听柝声。（原注：寇乱前报更旧俗未改。）

诗后题识为：“余一九四六年回乡一宿故家，尔后至至无锡。梦溪祖芬贤伉俪寄示旧宅照片，因忆此诗，录呈雅教。”最后是钱先生的铃章。读钱先生的信，是一种享受，每一封都要抖几个包袱，至少也要抖一个，真的是妙趣横生，无人可及。

不敢见钱先生

1998年钱先生病逝时，我正在哈佛访学。内子的《不敢见钱锺书先生》一文，即写于北美，其中记叙我们与钱先生书信往还的一些细事。当我们与钱先生通信那段时间，经常是又怕打扰他，又盼望接到他的信。

一天早上，内子跟我说：“钱先生希望我们去看他，我有感觉。”我是相信祖芬的直觉的，如同她也特别相信我的直觉。当天晚上就接到了钱先生的信。可是直到后来，我们还是没有去看望钱锺书先生。

一次，好友汪荣祖先生来北京，他约我一起去拜望钱先生，结果还是没有去。缘由何在呢？也许，就是内子文章的标题标示的：“不敢见钱锺书先生。”

一代学人

高远东：事实上您读书时结识到的也正是最具风骨的一代学人，比如杨晦先生、王瑶先生，能否为我们谈几个您印象最深刻的良师益友？

严家炎：现在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杨晦先生，就谈杨晦先生吧。杨晦先生是我们到了北大以后的第二天早晨见到的，大概八点钟他就从家里面出来了，恰好我快要走到文史楼。文史楼那个时候是中文系的一个楼，主要是工作所在地。我见到了杨先生，这是第一次见杨先生，非常高兴。杨先生那时已经满头白发，他是一位非常亲切、可敬的教授，是系主任。还有一位导师，是钱学熙教授，侧重在英文方面指导我们。

杨晦先生对我的影响主要是学术方面的。那时候，胡经之、王世德和我三个人都是杨先生的学生，我们跟杨先生在一起谈话的时候，是非常亲切活泼的。我们常常跟杨晦先生一起讨论学术问题，有些时候意见不一致，那就争论，争论也很多。我们师生关系非常亲近，有时大声地交谈争论，争论到很深入，难以想象。但转过身来，跟杨晦先生又能很亲切地谈好多问题。

《四海文心——我与北大中文系》选载之三

唯实求真的学问与人生

造这样的课题，是从那里开始的。我觉得这辈子，这个印象是蛮深刻的。

我在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学了半年，讲课的老师中有一位是刘雪苇先生，他是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的教务长。这位老师讲课非常突出，他给我们谈思想的改造，谈得非常深刻。他自己就是从延安过来的，1936年去延安，然后在延安他自己也参加学习。我们当时其实就十五六岁，准确一点是16岁，年纪很轻的，但就接触了思想改造的问题。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段经历。我觉得听了他讲的那些东西之后，真有帮助，心悦诚服地愿意让自己成为革命海洋中的一滴水。如果是一个没有水平的人，在那里讲不出什么名堂来，我相信效果一定是很差的。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另外一位像刘雪苇这样把革命、土改，还有各种各样的内容讲得那么深刻的老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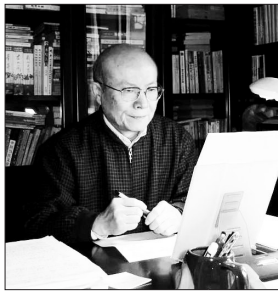
攻读北大副博士

曲楠：您之后就进入北大开始攻读副博士学位，这是怎

样一种学位设置？

严家炎：1952年我们国家决定了一个方向就是要学习苏联。苏联没有硕士研究生，它叫副博士研究生。学制四年，正式授予学位，副博士之后就是博士了。北大登广告已经是1956年夏天了，考试的时候是9月，1957年春节后入学，学四年的话就是1961年的春节才毕业。当时说是有学位，但是到了1958年，毛泽东发话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，以后军队取消了元帅、大将、上将、中将军衔，大学就取消了博士、副博士学位。研究生还是要招的，但是说明了将来毕业的时候没有学位。我为什么后来没有学下去呢？倒不是因为这个原因，而是1958年10月组织上决定把我提前调出来，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北大中文系青年教师没有几个了。

我1957年2月进北大读研究生以后，那是拼命用功，埋头苦读的。忽然系里把我叫去谈话，我恳求不要把我提前调出来，到1961年毕业了再调，那时你愿意叫我做什么我都服从分



严家炎

配。他们说不行，没有征求我的意见，已经报到北京市的人事局去了。北大这样的学校，业务上归教育部管，但是人事权的变动是由北京市委组织部和北京市人事局来管。他们说我们已经报过去备案了，市里也已经点头了。最后我就只好答应了。这样就在1958年10月底的时候确定让我出来，承担下学期留学生的课，给我准备的时间也就是两个多月。我的副博士研究生生涯就这样结束了。

当时有二十几个外国的学生，有苏联的，有东欧的，有朝鲜的等等。我给他们讲中国的现代文学，也有一点古典文学。从此我也就从文艺学跑进了现代文学，一开始就放不下来了。



进入华东人民革命大学

曲楠：严老师，您在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之前，没有正规大学的学历，就读的是华东人民革命大学。

严家炎：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进北大是1956年，因为当时在开“八大”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），我陪着铜官山矿务局的一位局长到北京来。接着几个月以后正式入学，是在1957年2月份。这个有点特殊，一般不会在1957这个时候入学，但我们恰好是1956年考进来，然后被安排到1957年2月正式入学。

我高中毕业以后，在1950年2月先进了华东人民革命大学，之前进的是华东团校。这段经历应该说时间不算很长，但是谈自己的思想转变、思想改